**借鉴与抉择**

**——试比较吴玉章、胡汉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严昌洪

**（严昌洪，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它的参加者们都对它进行了反思。反思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对这些人后来的人生道路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孙中山、章炳麟、吴玉章、胡汉民等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所以在“五四”以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除了别的原因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起了一定作用。笔者拟从这样一个侧面来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本文中仅以吴玉章、胡汉民为例，进行比较研究。

　  **一**

　　在比较了吴玉章和胡汉民的生平以后，可以发现，他二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的年龄，仅相差一岁。他们出身的家庭环境，都是从小康走向中落。在青年时代，两人曾习过举子业，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03年前后相继去扶桑留学，接受资产阶级近代教育。他们同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成为舆论宣传和武装斗争的骨干。1912年初，两人均任职南京临时政府，都为辅佐孙中山作出了贡献。“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中都参加了讨袁和护法斗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两人均于1919年开始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思想。后来，两人又都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担任了领导职务。

　　吴玉章、胡汉民以上极其相似的经历，表明他们两人均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成为真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们为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都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也都为挽救革命作了努力，为寻找新的救国之路而进行探索。他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努力和探索都是十分可贵的。

　　在他们辛亥前后相似的经历中，也有某些不同之处。例如，“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相继流亡海外，吴玉章去到法国，胡汉民跟着孙中山又来到日本。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生了分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初步反思，是产生这种分化的原因之一，孙中山等人认为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不在袁氏兵力之强，而在同党人心之涣散，党人没有切实遵循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建设方案行事。为进行第三次革命，许多党人通过宣誓和盖指模的方式在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下重新集结。黄兴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党人不听孙中山的话，而在于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挽救之方不在于“以权利相号召”，而要从根本上做去。他们不苟同中华革命党的做法，又恐妨碍孙中山的行动，便退居局外，到美国或南洋去了。另一些党人看见天下由自己打下来，坐天下的却是袁世凯，心中愤懑不平，但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走上了逃避现实的道路。这段时间，流亡的生活，低落的情绪，使吴玉章和胡汉民对辛亥革命都不可能有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只是认识到辛亥革命不仅没有解决民生问题，连民权问题也没有解决。至于为什么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国家，却仍然没有出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图景，他们二人的认识又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吴玉章来到法国这个新的环境，视野开阔了，看到了许多新事物，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接触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此时的欧洲不是十年前“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形势，而是处在火山爆发的前夜。虽然当时他只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审视社会主义，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关于“世界大同”的学说都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他毕竟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关于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美好理想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更值得追求。这种认识使吴玉章曾一度接近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并喜欢上克鲁泡特金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似乎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但他终于没有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连同盟会松懈的组织状况尚且给辛亥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无政府主义者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更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他又没有参加孙中山在日本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因为他此时不仅远离孙中山等人，而且在思想上也不赞成该党只重集中而不民主，不以党作中心，而以个人为主宰的独裁制度。

　　胡汉民当时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可通过他所主持的《民国》杂志的言论归纳为三点：（一）“民国”是好的，民国的国会、宪法、内阁制等等都是好的，值得为之献身。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袁世凯“弁髦宪法，蹂躏人权，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只要打倒背叛“民国”的袁世凯，就能建立“完全的民国”。（二）孙中山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完全可以实现。革命的失败在于党员不听孙中山的话，以民族主义实现为胜利，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漠然置之，在革命后“朝气馁于无形，姑息是图”，奋斗生涯半途而废，反以孙中山的理想为诟病。主张今后要绝对信仰孙中山，全面贯彻三民主义纲领，为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而奋斗。（三）袁世凯敢于背叛民国，不过利用了国民的弱点；革命党人不能坚持奋斗，也是由于因沿了国民的弱点。他认为国民的弱点就是“避苦求乐，厌劳好逸”，思想保守，不愿改革。因此主张“为了救济今日国民之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7-178、377页。]。

　　胡汉民的反思基本上与孙中山一致而更系统，但没有产生像吴玉章那样的某种程度的新认识。他在“革命以外”寻找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党员和国民，丝毫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革命纲领、他们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有什么问题。从国民性的弱点方面找革命失败的原因，固然有一定道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关于“吾人最后之觉悟”的觉悟，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都是从这个角度反思辛亥革命的。但是，辛亥革命在改造国民性方面所下的功夫太少了，胡汉民对此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这也许就是辛亥前后两人极其相似的经历中所包含的最大不同之处。“五四”以后，吴玉章和胡汉民产生政见分歧，并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恐怕此时已在思想上初露端倪。

　　 二

　　他们以上相似的经历，还表明两人之间曾有过同志加战友的亲密关系。可是，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两人却成了势不两立的仇雠。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胡汉民以南京政府负责人名义所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吴玉章被赫然列于“罪魁”名单中，遭到通缉。

　　辛亥革命时期的两位亲密战友为什么会反目为仇？原因在于，在“五四”以后，两人逐渐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玉章在1923—1924年间，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胡汉民却在1926—1927年间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变成了反对革命的时代落伍者。这两位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在他们各自不同的转变过程中，分别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而此时，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又遭到了失败，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不能不痛苦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屡遭失败？他们开始探索革命的新理论，寻找救国的新方法。

　　吴玉章和胡汉民在“五四”以后，开始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唯物史观，并在各自的认识角度和认识水平上运用这新的思想武器，对辛亥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仔细对照他们的反思，差异是明显的。

　　（一）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各时代的经济。

　　吴玉章在读了《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等书籍后，认识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状况依然如故的原因在于，这场革命不仅政治上只是以少数人的专制取代了一人的专制，经济上也没有改变从前少数人专制的现实，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农仍然受着地主、资本家这些寄生虫的剥削，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吾国经济现状与欧美殊，贫富不均之害犹在幼稚，防止之已足，非有待于变更”[ 吴玉章：《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吴玉章文集》（上），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的观点。其认识已超越了孙中山的旧民生主义，孙中山在辛亥前后就曾持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决定了辛亥年间在经济领域里的革命是极其软弱、极不彻底的。吴玉章对布尔什维克“不做工者不得食”的原则极为赞成，主张强迫地主、资本家劳动，让寄生虫们“自食其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安定和繁荣。这实际上就是主张改变剥削制度，彻底否定了辛亥革命试图以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道路。

　　胡汉民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上述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所说明的“人类历史的进动原因”在于经济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指出归根到底在于“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闽星》第2卷第4号（1920年1月），转引自《胡汉民评传》，第126页。]的主张。这比以前他认为只要推翻了袁世凯，就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怎样“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呢？他没有明确的说明。他在另一个地方关于法国的一段话却可以作为注脚：“这几年的政治，完全是满清的余毒，改革不彻底，弄成只得个招牌，自然是该奋发的事。我们挂的招牌同法国一样，我们店子的货色就更比法国不如，我们也是有主义信条来革命的，如果晓得内容结果和招牌不对，就应该加倍地做功夫。”[ 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这就是说，要把中国从根本上改革成法国一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主张消灭剥削制度。这与他在“二次革命”后要建设一个“完全的民国”，实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主张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从经济制度上彻底挖掉封建经济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道路这一点上认识更深刻了些。这就是胡汉民学习唯物史观的最大“收获”。

　　（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页。]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用武力推翻了皇帝，但国家政权仅仅改换了一些名称，掌权者大部分是前清的官僚、政客，他们以“民国”的名义对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辛亥革命求共和而复归专制。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胡汉民等人原来认为是由于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和一些军阀窃踞了民国的政权，打倒了袁世凯等军阀势力，完全民国就可以恢复起来了。现在的认识有所不同，他指出：“这几年的政治，完全是满清的余毒，改革不彻底”，“革命革得不透彻”[ 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那么，怎样才是“彻底的改革”，“透彻的革命”呢？胡汉民的结论是对中国社会“必须要全部改造”。这“全部改造”的含义是，在经济上，挖掉社会腐败的总根基；在政治上，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上，不许官僚、军阀、政客及其他人染指。然而，如前所述，他经济上的“根本改革”是要用资本的私有制取代封建的私有制，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彻底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保证不产生新的官僚、军阀和政客。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比民国初年让出政权无疑是一大进步，但胡汉民的方案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

　　吴玉章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认为孙中山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位，是放弃掌握政权，而宋教仁所进行的议会斗争，是幻想用民主的方法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革命派进攻。中国许多罪恶的根源，就是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在这种制度下，所谓“好人政府”，点滴的“善政”，枝节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根深蒂固的旧势力。他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中看到了只有粉碎旧政治机器代以新机器才能铲除一切污秽。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14，113页。]他称“这真是治疗中国官僚痼疾的圣药”[ 吴玉章：《六十自述》，《吴玉章文集》（下），第1283页。]。

　　（三）列宁告诉人们：“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3页。]辛亥革命先胜后败的实践正好印证了列宁主义的这一原理。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开始改变了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了“扶助农工”，依靠工农大众进行“国民革命”的新方针。这是孙中山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吴玉章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反思的结论是：从前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这个教训使他认识到，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14，113页。]。吴玉章把眼睛由“向上”改为“向下”，找到了一种能够对抗中外反动派的强大力量，并积极“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从而避免重蹈辛亥年间革命力量弱小而导致失败的覆辙。

　　胡汉民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稍稍改变了对人民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采取了同情、支持的积极态度。他在这时反思辛亥革命，调子与前只强调国民心理的保守、惰性的消极面多少有了些不同。他回忆说，在上海南北议和时，有人曾主张扃门开会，理由是“不要受群众心理的影响”。他认为这是对群众十分轻蔑的意思，“这些人的脑筋，提起群众两字，早就觉得不妥。好象是可厌可憎的，一概不必理会他的”。他对这种态度表示不赞成。但是他的进步也只能到此——不轻蔑群众——为止，他用以反驳轻蔑群众，攻击群众心理的观点的证据，就是“五四”罢学罢市风潮“没有什么过分”，“没有什么暴烈的运动”，“不是极端的感情用事，很受理论的支配”[ 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这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希望用自已的“理论”去支配群众，控制群众，以免出现“过分的”或“暴烈的”行动，他要把群众运动纳入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所设计的“秩序”的规范里面。一旦人民群众自已起来革命，并不听命于他们所指出的道路，而进行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时候，胡汉民之流就大肆攻击是什么“过火行动”、“暴烈运动”、“痞子运动”等等，而采取镇压的立场，从而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不得不再次陷进遭受失败的泥淖。

（四）革命政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未有革命党软弱涣散、脱离群众而革命不失败的。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作了各种努力，但一直“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页。]，这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反思，孙中山决定接受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以输进新鲜血液，并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方法对国民党作根本的改造。于是又有了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在政党问题上所达到的高度，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胡汉民此时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的认识下文将有详论，兹不赘述。

　　前已述及，吴玉章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期间，既不赞成无政府主义者不要组织的主张，又不苟同中华革命党的旧式会党的组织形式，究竟怎样才好，始终抱着疑问。这多年在心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方法中得到了圆满的解答。他认识到党要由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党是战斗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先锋队，它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核心力量。终于，他在1923年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与杨闇公等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在北京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没有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也没有参加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却毅然参加了当时力量尚很弱小的共产党。这用“崇尚时髦”或“随风应变”之类的解释都是不妥当的。这种抉择，是他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舍弃已被事实证明走不通的法国式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接受俄国式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经历了吴玉章相同转变的董必武，在“五四”以后所说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们这一代革命家的心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转引自何浩等主编：《历代爱国名人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这种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已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

　　也许在1919—1921年那几年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要比吴玉章系统些，深刻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比吴玉章做的还多些，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因何在？有的研究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多方面的原因，兹不引述。他们最后指出了根本的原因：胡汉民“他们的阶级属性紧紧拖住了他们的后腿，使他们在距新政治起跑线仅一步之遥时却裹足不前了”[ 周聿峩、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41页。]。他们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人们总感到不满足。与胡汉民出身和经历相似的吴玉章为什么可以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体会变成“新道路的起脚点”呢？显然仅用“阶级属性”来解释似乎还不够。除了阶级属性方面的原因以外，与一个人是否能认识时代的潮流，并与时俱进，不惮以否定旧我，自觉改造世界观等主观努力有很大的关系。阶级属性不由己，人生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我们只要仔细读一下吴玉章1924年4月13日在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就不难发现，他已提高到了“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也就是说，他已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了适应这一规律的自觉性。他对辛亥革命道路的否定，不是感性认识的产物，而是理性反思的结果。

　　首先，吴玉章在演说中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区分了改良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最为流行。因为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他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使他有可能认识孙中山旧民生主义的主观性和空想性，而选择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在肯定法国大革命巨大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革命的阶级实质：《人权宣言》中所说的人民，仅仅是指第三等级的市民，并不是说一切的人民。故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工商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而且只是政治上的革命，不是社会上、经济上（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它的胜利使第三等级握有政治特权，得以自由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变成大资本家，从而使社会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法国式的革命于多数人民不见有什么好处。过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自居，他们以为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也是为了全民利益的，故引以为中国革命的榜样。现在吴玉章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和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对它感到失望了。对法国大革命道路的失望，间接反映了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因为他明白了孙中山旧民权主义的阶级实质。

　　再次，吴玉章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下去，出现不可克服的矛盾，便会产生帝国主义。他揭露了资本-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认为要求得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内的和平，只有第四阶级（劳动阶级）奋起，与苏维埃俄国联盟，推倒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使他与旧民族主义划清了界线。

　　最后，吴玉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主张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打破建筑在武力之上的资本制度，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对旧三民主义的反思，没有使吴玉章像孙中山那样成为新三民主义者，原因盖在于此。吴玉章对整个历史运动的前景作了这样的描绘：“将来世界各国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将大联合共立于法西斯主义旗帜之下，对于第四阶级（劳动阶级）施行总攻击。而世界各国的第四阶级（劳动阶级）自然也会大联合共立于波尔希维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对于第三阶级（资产阶级）施行总攻击。现在这个世界也需要经过旗帜鲜明、堂堂正正的阶级战争之后，种种社会问题才有一个总解决。但是最后的胜利终必归于劳动阶级，这是可以断言的”。意味深长的是，他在演说中劝告人们：“我们既立于此世界，即为战斗员之一，欲加入何方，须早决定，万不能游移两可。因为此等战争决无中立的余地。”[ 吴玉章：《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吴玉章文集》（上），第53—63页。]而吴玉章自已带头作了决定，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行列中走出来，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方。

　　胡汉民既没有否定旧我的勇气，又未能像吴玉章那样认识到整个历史运动的规律，所以他只能“在距新的政治起跑线仅一步之遥时裹足不前了”。

四

　　吴玉章、胡汉民自始自终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都利用自已的地位对国民党施加影响，胡汉民希望国民党在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恢复生机，继续走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而吴玉章则希望把国民党变为一个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且通过列宁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思想指导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并把这场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在自已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中，都利用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

　　（一）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很容易使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联想到民国初年的国民党的改组。胡汉民在《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中，回顾了民国初年的那段历史：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时，他怕自已壁垒不坚，因手段而蒙混了目的，因分子不纯而累了团体，开始并不赞成改组，他所负责的广东同盟会是在比较晚些的时候才改称国民党的。改组后，主义、目的由于环境和自已手段的限制牵扯，不像辛亥以前那样鲜明了，党人对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使命的工作也不努力了。胡汉民对民初国民党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却因为民初国民党的失误而对此时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忧心忡忡，他担心容共会重蹈民初国民党的覆辙，党员因此便不能严加甄别，本党团体便不能巩固，而主义便不能贯彻。所以他对孙中山联共的政策并不热心，但出于对孙中山的信仰和尊童，他又不敢公然反对。他在持保留态度的前提下勉强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同时在改组过程中又极力对共产党进行限制和防备。他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像浙奉籍人员改而来隶属广东军政府那样“听受编制”，像辛亥前三点会、哥老会参加同盟会那样任凭调遣，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遵从三民主义，受到完密的组织和纪律的约束。这实际上是把“容共”变成了“溶共”，要国民党把共产党吃掉。

　　吴玉章是在国民党二大作《四川省党部党务报告》的时候谈到民初国民党的。他说：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时，革命党人为抵抗官厅，将地方上的无产阶级——哥老会——武装起来，称为保路同志军，名曰保路，实为革命。到革命成功后，由哥老会造成的同志会就完全变为革命党了。同盟会既改为国民党，这一班人也就是国民党。吴玉章认为四川国民党自来结合无产阶级，站在革命线上，和资产阶级当然是对头，被资产阶级的人视为流氓、危险分子是不足怪的。而国民党有了这样伟大的民众势力，党员遍布于四川，所以革命党在四川特别发达，进步党虽狡猾亦终不能抵抗[ 吴玉章：《四川省党部党务报告》，《吴玉章文集》（上），第71页。]。诚然，他将哥老会笼统地看作是无产阶级，说哥老会都成了革命党又都成了国民党，是不准确的。但他以此事来说明国民党只有不怕被人攻击为“流氓”、“危险分子”，勇敢地在民众中发展组织，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势力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

　　（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孙中山通过反思，认识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有许多局限性，毅然把它改造成新三民主义，说明他不愿原封不动地继续走老路。他在1922年就曾明确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孙中山：《在广东旅桂同乡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507页。]而胡汉民1923年元月在与汪精卫所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强调，国民党的屡遭挫折失败，“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有颠躓而已”。这短短一句话，足以表明他此时的心态，即不承认自已所信奉的主义和纲领存在什么问题，不容许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国民党，企图沿着辛亥革命的既定目标走下去，联俄、容共无非是请苏俄和共产党从旁协助，使国民党在具体进行中克服“偶有颠踬”的弱点。尽管在《宣言》中不得不按孙中山的意思写进对三民主义的一些新的解释，反映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开始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但是胡汉民本人思想上的主流还是旧三民主义的货色。他强调国民党的改进必须“依三民主义之原则”，而他所提到的民权主义，只注意人民的一般性自由权利，没有涉及人民参政或掌权的问题；他所提到的民生主义，只注意民穷财尽，人民生活困苦的现状，而没有涉及人民取得生产资料（诸如“耕者有其田”之类）的问题。他的民族主义，仍是不敢刺激帝国主义的旧民族主义。胡汉民在同盟会时代曾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中坚”，孙中山首次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民报发刊词》就是由孙口授由胡执笔的。他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曾系统地阐述过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诚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三民主义“也凝结了胡汉民的一份心血”[ 周聿峩、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41页。]。讵料这竟成了他的一个包袱，影响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进步。在这方面他似乎比孙中山要保守得多。

　　吴玉章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新认识出发，指出辛亥革命时，一般革命党人只知道十八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旧方法应付现有的新环境，当然是走不通的。他告诫国民党人，时局常常变化，拿死方法来应付新环境，是不能适合的。应该随时势的变迁，决定进行的方略。他以真诚的态度帮助国民党人从已被事实证明是走不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转过来，而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广阔道路。他特别重视民生主义，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都是为的民生主义，因为民生主义才是革命的主要目标，现在中国所适宜的是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他也不掩饰希望将来革命的发展会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主张使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保持了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

　　（三）改组后的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应抱什么态度？胡汉民虽然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写进了“力图改修条约”即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但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他却支持国民党右翼分子黄季陆的意见，即同意在宣言中删去收回租界、海关和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主张“把关于反帝国主义的政纲条款说得笼统抽象一点，不必太明显的提出”[ 黄季陆：《初生之犊不畏虎》，台北《传记文学》第4卷第4期。]。这又是他对辛亥革命的记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资产阶级给革命以很大的支援和帮助，武装起义所需要的大量款项大都是向他们募集的。胡汉民曾任同盟会南洋支部支部长，在南洋一带发展党务，筹集经费，与华侨资产阶级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时，他害怕激烈的反帝纲领会刺激帝国主义，给华侨带来麻烦。所以说，胡汉民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不敢刺激帝国主义的旧民族主义，在反帝问题上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种先天的软弱性。可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人如果害怕帝国主义，不敢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同帝国主义妥协，那就不可能做出任何真正对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在内）有益的事情。

　　吴玉章早在五四运动后就批评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此时，他又大力宣传国民党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纲领，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以往丧失的各种主权，取缔外国人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和文化侵略，并重新审定所有外债，“即凡一切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之工具，一般要打倒它、廓清它”[ 吴玉章：《中国革命问题——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讲演》，《吴玉章文集》（上），第105页。]。他认为国民党不必害怕这些行动会刺激帝国主义，更不能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而退步，应利用此种压迫更加促进革命时机之成熟。吴玉章的这些主张，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帝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四）在改组后的国民党执行联俄政策的问题上，吴玉章和胡汉民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吴玉章从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联合绞杀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不能以平等待我，又从苏俄否定沙俄时代侵略中国的政策，主动宣布放弃过去沙俄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一切非法特权的友好行动中，看到只有苏俄才是以平等待我的国家，因而主张国民党应坚定不移地执行联俄政策，而不能像辛亥时期那样幻想帝国主义能帮助中国革命。这种认识是与孙中山《遗嘱》的精神相一致的。同时，吴玉章认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引起各国人的注意，而辛亥革命各国不十分注意，其原因在于现在的革命带有国际性质，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世界革命以苏俄为旗手，以列宁主义为指导，苏俄与中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他从这样的高度进一步认识联俄政策，因此执行起这个政策来是那样的自觉和坚定不移。

　　胡汉民却不是这样。他对联俄本来是有保留的，后来终于站到了苏俄的对立面上去了，原因固然很多，而他看见苏俄的政治制度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出于国民党的狭隘利益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他将孙中山在世时为服从领袖所勉强做的事情都翻了过来，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7-178、377页。]的口号，否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一种“政策”。为了使自己在原先所写的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面前不致感到尴尬，他宣称马克思主义只能实用于欧洲，不适合于中国。他污蔑中国共产党是捣乱分子，是与国民党争权的袁世凯式的“反革命”。曾以“中派”相标榜的胡汉民，终于成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右派，与他的政敌蒋介石合流，大搞起“清党”来。

　　诚然，胡汉民为了他那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进行了毕生的探索与奋斗。但是他始终未能为中国和个人找到出路。当他所坚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蒋介石所实行的个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终于被蒋介石视为绊脚石而遭到囚禁。此后一蹶不振，抑郁而逝。而他早年的战友，后来的政敌吴玉章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却在中国得以实现，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吴玉章本人这种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精神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和崇敬。历史的这种结局告诉人们：吴玉章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对后半生道路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国亿万人民的愿望。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专辑；《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